

湖州藏书文化的地域特征^{*}

胡淑娟

(湖州师范学院 人文学院, 浙江 湖州 313000)

摘 要:湖州藏书文化地域特征明显,主要表现为:藏书与著书相结合,藏书与刻书密切相连,藏书与售书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产业链,藏书的内涵丰富而富于文化的张力。藏书家的藏书目的和意识各异,但殊途同归,都为中华民族的文化事业做出了不可多得的贡献。

关键词:湖州;藏书家;文化史;贡献

中图分类号:G25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1734(2011)04-0029-04

在中国藏书文化事业中,湖州人贡献卓著,大可特书一笔。“湖州乃是浙江藏书事业的发祥地”之一,^{[1] (P9)}湖州藏书贯穿于中国藏书的始终,自南朝至民国藏书事业绵延不断,世家辈出。湖州藏书家藏书多,且十分讲究版本;不仅藏书,还刻书贩书售书,足迹遍布大江南北,围绕“书”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产业链。湖州在中国藏书史、文化史上的地位和贡献堪称无可替代。

—

湖州藏书文化历史悠久,根深叶茂。从最早可资证明的南朝宋、齐、梁三代吴兴最大的藏书家,也是全国最大的藏书家沈约藏书开始,生生不息,历代不衰。宋代陈振孙、叶梦得、周密名冠一时,周密还是南宋全国藏书之冠。元代著名的书画家、文学家赵孟頫也是著名的藏书家。明代有号称甲于海内的茅坤的“白华楼”藏书,据《明史·茅坤传》载:“其书盛行海内,乡里小儿无不知有茅鹿门者。”^{[2] (P7375)}另有沈节甫的“玩易楼”藏书,臧懋循藏有秘本选《元曲》,明末有藏书家潘曾紘。清代藏书家有严可均、刘桐、严元照、许宗彦,清末民初吴兴著名的四大藏书楼是陆心源的“皕宋楼”、刘承干的“嘉业堂”、蒋汝藻的“密韵楼”和张均衡的“适园”。其中尤以陆心源“皕宋楼”藏书声名显著。关于其藏书流失的原因、去向等,时至今日,仍是藏书界争论不休的焦点。

综观湖州藏书历史,一个明显的特征就是藏书与著书相结合。南朝沈约既是全国最大的藏书家,同时也是当时文坛的领袖。他通古博今,不仅工于文词,而且是“永明体”的创始人之一,对唐诗的形成、兴盛作用巨大。在梁代他是著名的“竟陵八友”之一。据《湖录》沈约“本传”称,“约家藏书十二万卷”,为全国之冠。因为有了富庶的藏书和昼读夜诵的苦读,他得以博览群书,而且著述丰富。他一生主持修撰了《宋书》(为《二十四史》之一)一百卷,著有《晋书》一百一十卷,《宋文章志》三十卷,《齐纪》二十卷,《高祖纪》十四卷,《述异》十卷,《谥例》十卷,著述丰富且价值极大。有关陈振孙的藏书,据周密《齐东野语》卷十二《书籍之厄》载:“今年惟直斋陈氏书最多,盖尝仕于莆,转录夹漈郑氏、方氏、林氏、吴氏旧书至五万一千一百八十余卷,且仿《读书志》作题解,极其精详。”陈振孙用了大约二十年的时间在搜集藏书的基础上,修改和补充了《直斋书录解題》。该书原本为五十六卷本,现行本为二十二卷本,系后人从《永乐大典》中辑出,全书分经、史、子、集四录,共著录图书五万一千一百八十余卷,是中国图书史上一部极为重要的目录学巨著。另外,他还修撰了地方文献《吴兴志》。南宋末年的周密,据其在《齐东野语》中载:“凡有书四万二千余卷,及三代以来金石之刻一千五百余种”。他在丰富藏书的基础上著述颇丰,先后撰成《武林旧事》、《癸辛杂识》、《齐

* 收稿日期:2011-04-02

作者简介:胡淑娟,教授,从事中国古代文学研究。

东野语》、《云烟过眼录》、《浩然斋雅谈》、《志雅堂杂抄》、《澄怀录》等野史笔记，《草窗韵语》、《草窗词》（一名《蘋洲渔笛谱》）等，选录南宋初年张孝祥至宋末元初仇远之词共132家词集《绝妙好词》。叶梦得藏书丰富，据周密称其藏书“至十万卷”。他能诗善词，以词著称于世，据南宋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題》著录，尚存有《春秋传》二十卷、《春秋考》十六卷、《春秋讖》二十三卷、《石林奏议》十五卷、《石林燕语》十卷、《避暑录话》二卷（或四卷）、《演戏放言》三卷（或作一卷）、《石林家訓》一卷、《建康集》八卷（或作十卷）、《石林诗话》二卷、《石林词》一卷，佚书包括《玉涧杂书》等近十种，内容包括诗文、词章、奏议、考释、笔记等，文学文献价值很大。明代茅坤编著了《唐宋八大家文钞》、《史记钞》，著有《茅鹿门先生文集》。建有“玩易楼”藏书楼的沈节甫，编有《玩易楼藏书目录》和明代大型丛书《纪录汇编》，丛书共收书达119种，卷帙丰富，这不能不与其家藏万卷密切相关。明代长兴人臧懋循所编《元曲选》保存了元杂剧96种，而我们现存元杂剧仅156种，足见其对杂剧史不可磨灭的贡献。他之所以能编选诸多的元杂剧，是因为家里收藏了许多元杂剧。他在《元曲选·序》中说，“予家藏杂剧多秘本”^{[3] (P3)}，数量既多，且又是世间罕见之本。另其还编有《古诗所》、《唐诗所》。清代乾嘉时有名的文字学家、考据学家严可均，藏书目的明确，“足供撰述可耳”，一生勤奋著书，著有《说文声类》、《说文校义》、《铁桥漫稿》、《唐石经校文》等传世。据《湖州府志》记载，“又校辑《经佚注》、《佚子书》等数十种，就中《孝经郑注》最完善”。还耗时27年辑成《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七百四十六卷，此书起自上古，下迄隋代，收作者3497人，且附每一作者小传，可谓辉煌巨著。拥有“眠琴山馆”的南浔人的刘桐著有《初游草》、《楚游续草》、《听雨轩稿》等。湖州石冢村的严元照，以藏宋元刊本闻名，著有《柯家山馆诗抄》。潜园老人陆心源的“皕宋楼”名闻海内外，他不仅是著名的藏书家，还是一位学者，编著有《仪顾堂文集》二十卷，《仪顾堂题跋》十六卷，《续跋》十六卷，《皕宋楼藏书志》一百二十卷，《续志》四卷，《金石粹编续》二百卷，《穰梨馆过眼录》四十卷，《续录》十六卷，《唐文拾遗》八十卷，《唐文续拾》十六卷，《宋诗补遗》一百卷，《群书校补》一百卷，《吴兴诗存》四十卷，《吴兴金石记》十六卷，《归安县志》四十八卷，《宋史翼》四十卷，《元祐党人传》十卷，《金石学录补》四卷，总称为《潜园总集》共九百四十种。著述成果之多，当与其富有之藏书互为因果。今天保存完好的南浔“嘉业堂”藏书楼之主人刘承干，藏书五十六万余卷，珍本尚多。曾编有著名的《十通》之一的《清朝续文献通考》等等，亦为清末著名的学者。

湖州藏书家的这种藏书与著书紧密结合的特点，造就了一大批学贯古今的大学问家。为中华民族的文化传承和文化创新作出了可圈可点的贡献。

二

湖州藏书文化更具地域特色的是藏书与刻书相结合，进而对古典典籍的保留与弘扬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随着印刷术的不断发展与进步，杭州在北宋时期已是全国闻名的印刷中心之一，“今天下印书，以杭州为上，蜀次之，福建最下。京师比岁印板，殆不减杭州，而纸不佳，蜀与福建，多以柔木为之，取其易成而速售，故不能工。”^{[4] (P116)}南宋时刻书虽以杭州为中心，但湖州在当时亦是刻书的重点地区之一。谢肇淛曾说：“今杭刻不足称矣。金陵、吴兴、新安三地，剞劂之精，不下宋版。楚蜀之刻，皆寻常耳。闽建阳有书坊，出书最多，且版、纸最滥恶，盖徒为射利计，非以传世也。”其肯定了吴兴“剞劂之精”堪与宋版比肩，可见吴兴刻书在中国古代刻书史上的贡献之大。毛春翔《古书版本常谈》也提到吴兴刻书的重要地位：“徽州、吴兴乃后起之秀，岂但与苏常争价，实已超越苏常。苏、常精刻，多在嘉靖之世，万历间，已让位于吴兴、新安了。”^{[5] (P66)}古代湖州刻书以精制取胜，名噪一时。宋代私家刻书和家塾刻书就很盛行，据毛春翔《古书版本常谈》记载，吴兴施元之刻书可与宋代著名私人刻书家岳珂、廖莹中、光都费氏、黄善夫、魏仲举、程舍人诸家媲美。另外，湖州官府也有大量刻书。据明代嘉靖时周弘祖所撰《古今书刻》记载，明代前期、中期湖州府当时刻有《皇明诗选》、《吴兴志》、《楚辞》、《赵松雪文集》等四种，这种风气对民间刻书影响很大。湖州茅以相的文霞阁当时就刻有《心上便是钟》、《汉蔡中郎集》、《新刊唐荆川稗编》、《淮南鸿烈解》等等。

明代湖州最值得骄傲的出版家是晟舍闵、凌二家之刻书。近人叶德辉《书林清话》卷八《颜色套印书始于明季盛于清道咸以后》载：“朱墨套印，明启祯间，有闵齐伋，闵昭明、凌汝亨、凌濛初、凌瀛初，皆一家父子兄弟刻书最多者也。”^{[1] (P177)}受邑中织造染色技术的启示，当时他们两家的彩色套印技术全国堪为首屈一指。据杜信孚《明代版刻综录》载，仅明代万历、泰昌、天启、崇祯四代吴兴闵家就刻印了《楚辞》、《花间集》、

《会真六幻西厢》等38种之多,凌家刻印的彩印本有《唐诗绝句类选》、《大佛顶如来密因修证了义诸菩萨万行首楞严经》、《周礼训笈》、《李长吉歌诗》等23本之多。出版家闵齐伋(1575~1657年),字乃武,号寓五,晚明文学家,为套版印刷技术的创始人之一,出版书近300种,其中双色至八色套印约150种,号称“闵刻”。此前诸多学者都认为闵凌二氏对中国印刷术最大的贡献在于套印技术中首次采用了五色套印,这种说法是不确切的。闵刻中最有价值的是分版套印达八色之多、叠版准确的《西厢记彩图》。该书刻成于崇祯十三年(1640年),共有图21幅,双面连式(一图跨双幅),高32公分,宽20公分,版式大方,画面结构谨严,刀法圆浑有力,线条流畅清晰,人物形态毕现,场景疏朗有致,体现出刻工奇巧烂熟的工艺技巧。色彩变化由深而浅,多色相互辉映渲染,可谓上品。这种套印要求技术极高,因构图线条丝细,印刷时稍有不慎,很易损伤断裂。所以闵刻《西厢记彩图》是综合各种技艺完美结合而成,为晚明版画彩印中的极品,也是世界版画彩印中的极品。该书孤本现藏于德国科隆东方艺术博物馆,问世迄今已有367年的历史,其在中国印刷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也足以证明中国印刷术在世界印刷文化中的卓越地位与贡献。

湖州藏书家很多本身就是出版家。拥有“白华楼”藏书的藏书家茅坤“曾刊刻过明郭正域的《解庄》、《墨子》”,自编的《唐宋八大家文钞》在家乡也曾刊刻过两次。藏书家沈节甫编有明代大型丛书《记录汇编》,该丛书在丰富藏书的基础上,采集了嘉靖前的诸家杂记达119种,在《四库全书》中存目,具有重大的史料价值。藏书家臧懋循也是一位著名的刻书家。在万历年间曾刊刻有插图本汤显祖的《玉茗堂四种曲》八卷,万历四十三年又刻印了自编的《唐诗所》和《历代名士爵里》等。民国藏书达六十万之举的南浔“嘉业堂”藏书楼之主人刘承干继承明清两代利用其藏书刊刻丛书的传统,不但刻书量大,而且刻书质量要求极为精湛。“每刻印一书,事先必请专家鉴定,再请权威学者校订稿本,然后付刻。”^{[1](P265)}他曾刊刻过清代著名史学家章学诚的《章氏遗书》,为章氏之学的保存与传播作出了重大贡献。他请当时著名的金石学家褚德彝校订了《希古楼金石丛书》,而后刊刻。此外当时一些著名的学者都曾为刘承干刊刻的《嘉业堂丛书》、《求恕斋丛书》、《吴兴丛书》等校订过书籍,如吴昌硕、王国维、郑孝胥、况周颐、朱古微、张元济、罗振玉、藐荃荪、叶昌炽等。校订后还请专家作跋,说明所刻书籍的渊源和价值,最后始交刻印。“刘承干所印之书共约二百几十种,约三千卷,所耗费值钱计约三十余万(包括请人编、校、抄、鉴定等)”^{[1](P266)}而且他刻书非以营利为目的,而是为送人,包括一些外国友人。他自己在建嘉业堂时曾说过“余之为是楼,非徒藏之,又将谋所以永其传”。这位被鲁迅称为“傻公子”的藏书家为中华民族的出版事业及文化的保存和传承作出了重要贡献。

三

湖州人在藏书、刻书的同时,还致力于图书文化经营活动,对文化传播起了重要的作用。湖州因藏书家多、刻书家也很多,而且版本及刻书质量皆好,得到时人的认可,故兴起一个新型的书业文化产业链,即在藏书家、刻书家、书商中形成一个良性的循环,尤其是书商在图书流通过程中起了很大的作用。书商原指以经营书籍买卖为主要营生手段者。在文献资料中关于书商、书肆名称的叫法很多,如书估、书贾、书友、书客、书佣、书僮、书馭及书船、书棚、书摊、书铺等等。另有坊贾、船贾、坊肆、冷摊等,虽名目不一,但仍是指称书商、书肆的。

出版家利用家藏书籍的最好版本刻书售卖以赚取利润,比如凌蒙初等,但他们主要仰仗书商实现其获得利益的最终目的。书商形式多样,既有开铺设摊之坐贾,也有肩挑船载、四出兜售之行商。湖州一带更有书船一业,谓之“湖船”,是行商中极具地方色彩的一类。湖船利用江南湖泊河网交叉、水路发达之利,昼夜舟行于杭嘉湖、苏锡常一带,过街穿巷,收售书籍,信息灵通,对图书传播与流通贡献很大。书商经营有极大的游动性,他们四处游走,交际面广,信息丰富。而书商的这一特点及本事恰为藏书家所欠缺,也因此为藏书家所倚重。

藏书家购书,是以书商为主要中介的。如明代藏书家沈节甫在《玩易楼藏书目录》中所言“每遇货书者,惟恐不余售,既售且去,惟恐其不复来也。”所获之书主要来自于“货书者”。刘承干在他的《嘉业堂藏书楼记》载其藏书肇起:“宣统庚戌(1910年),南洋开劝业会于金陵,瑰货骈集,人争趋之,余独步状元境各书肆,遍览群书,兼两载归。越日,书贾携书来售者踵至,自时即有志聚书。”刘承干之藏书缘起于书贾的“踵

至”，也即书贾的殷勤货卖逗起了他货书、藏书的意念和兴趣，也成就了一代藏书大家。

湖州书商古往今来名噪一时，为中国文化贡献永载史册。在乾隆皇帝征集《四库全书》时，曾向湖州书商征集。据翁方纲《翁氏家事略记》记载，乾隆皇帝曾发谕旨：“……又湖州向多贾客书船，平时在各处州县兑买书籍，与藏书家往来最熟，其于某处旧有某书，增购某本，问之无不深知。”乾隆接着指示臣下，采访遗书要多向这些书商咨询，以求得帮助。各地书商果不负所望，“是时江浙书贾皆踊跃，遍征善本足资考订者，悉聚于五柳居、文粹堂诸坊舍，每日检有应用者，辄满车以归。”乾隆皇帝知晓湖州，与湖州书商的社会知名度和独有的社会作用是分不开的。

湖州书商还将“书店”开到了北京。据史料记载，老韦，湖贾业书之佼佼者，在北京琉璃厂开设有瑞锦堂书肆，业绩、声望俱佳。纪晓岚、查莹等与之过往甚密。李文藻《琉璃厂书肆》、叶昌炽《藏书纪事诗》皆有详记，又皆莫能名之。即使在今天这也是件需要勇气、资金和经验才可以完成的事业，但在固守田园思想和交通欠发达的古代，湖州书商的行为和业绩不能不说是一个伟大的壮举。

湖州藏书家之所以能够节衣缩食，倾囊沉入这一精神的至高境界中，与其极高的思想认识是分不开的。明嘉靖时湖州藏书家姚翼，有贮书万卷的“玩画斋”。于万历年间（1537～1620年）曾刻有自著之《玩画斋杂著编》八卷行世，在自序中道出了藏书的真谛：“乃若书之好，千万人无二三焉。方吾之好而聚之也，人将群嗤之不暇焉，能更有同好者睥睨其旁哉？而况为其子若孙者，纵非皆能读父书，而目染耳濡之余，或稍稍习俭素以自保。且非甚狂病不肖，当不忍死其亲而损其所甚好；虽欲捐之，又或苦于售之不易而中沮，然则吾之好书，虽限于力而不能多致，使汗牛充栋，窃独喜其可久据以为吾有也。故特斋而藏之，又籍而录之，使由吾之子若孙，以传于世世，不特贤而能读吾书者之所宝贵，而或附益之，虽中材以下，苟非甚病狂不肖者，因以知我所好之甚，虽不幸而免于饥寒，或姑存之而不强售于非所同好云耳。”（《吴兴藏书录》）。它用自己的箴言和行动实践着“遗子黄金满籝不如一经”的遗训。他们固守着传统的读书理念，倾其全部钟情于藏书事业，不为世人皆爱珠玑珍宝世俗观念所囿，堪为精神世界的佼佼者。

参考文献：

- [1] 顾兴志. 浙江藏书家藏书楼[M]. 杭州: 浙江人民出版社, 1987.
- [2] 明史[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4.
- [3] 藏懋循. 元曲选[M]. 北京: 中华书局, 1958.
- [4] 叶梦得. 石林燕语[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4.
- [5] 毛春翔. 古书版本常谈[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3.
- [6] 叶德辉. 书林清话[M]. 沈阳: 辽宁教育出版社, 1998.

The Regional Features of Huzhou's Book - collecting Culture

HU Shu - juan

(School of Humanities, Huzhou Teachers College, Huzhou 313000, China)

Abstract: Huzhou's book - collecting Culture has its outstanding regional features, mainly characterized by a combination of book - collecting and book - writing, book - collecting and book - carving, book - collecting and book - selling and rich connotation of book - collecting with colorful cultural implications. The book list and the awareness of keeping books of the bibliophiles vary but their intentions are the same. All of them have contributed a lot to the cultural cause of the Chinese nation.

Key words: Huzhou; bibliophile; cultural history; contribution

[责任编辑 陈义报]